

一代天骄

——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五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黄允升 李新芝 主编

下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

一代天骄

——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怨情仇

王若水



一代天骄毛泽东

(下卷)

黄允升 李新芝 主编

第三十五章 战略转移	(557)
第三十六章 开国大典	(517)
第三十七章 社会主义改造	(541)
第三十八章 抗美援朝	(554)
第三十九章 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	(602)
第四十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	(617)
第四十一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639)
第四十二章 正确处理“一统”与“分”的关系	(641)
第四十三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	(648)
第四十四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	(707)
第四十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	(717)
第四十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	(725)

红旗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战略决战	(457)
第二十六章	开国立业	(517)
第二十七章	和平解放西藏	(544)
第二十八章	抗美援朝	(554)
第二十九章	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	(602)
第三十章	高、饶事件	(617)
第三十一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639)
第三十二章	主持编写“一论”、“再论”	(661)
第三十三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	(680)
第三十四章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	(707)
第三十五章	特赦战犯	(717)
第三十六章	庐山风云	(725)



目 录

第三十七章	召开七千人大会	(741)
第三十八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749)
第三十九章	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763)
第四十章	发展原子能事业	(768)
第四十一章	发动“文化大革命”	(774)
第四十二章	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	(791)
第四十三章	“解放”老干部	(800)
第四十四章	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808)
第四十五章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815)
第四十六章	最后的选择	(823)
第四十七章	面对美国	(828)
后 记		(888)

第二十五章 战略决战

一、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及各项政策

毛泽东是在一次长达约 20 天的颠沛行军途中，谛听南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脚步声的。全国的形势的确是越来越好，但在陕北这个局部，暂时仍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仍须不时地躲避强敌的合击和追踪。

在小河村会议确定“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方针后不久，胡宗南为与集结在榆林附近的西北野战军决战，又督其主力向北推进。刘戡率领的整编第 29 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线，朝大理河扑来。从 8 月 1 日起，中央纵队又一次匆匆跨上马背，改代号“三支队”为“九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的率领下，离开平安居住了 40 来天的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作远距离转移。这次敌军因屡屡扑空，数次挨打，不敢稍有懈怠，一股劲儿地尾随在中央纵队之后，穷追不舍。从大理河追过无定河，又经绥德城追到葭芦河一线，实际上已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逼至黄河汉，即黄河的入水口。如果再东进一步，在人们看来便算是渡过黄河了。

前有因连日大雨而暴涨的河水，狂浪可将刚下水的羊皮筏像草叶一样卷得无影无踪；后有数万追兵紧咬不放，枪弹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不远处便是黄河汉口，几乎是一抬腿即可到达河边。站在风雨交加、巨浪喧嚣的葭芦河西岸，毛泽东费力地点燃了一颗侥幸未被浇湿的纸烟，直吸到长长的烟灰向下跌落。要不要渡河求得脱离险境，此刻正等待他作出最后的抉择。中央纵队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已经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解放区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句“毛主席还在陕北”，千难万险、流血牺牲统统不在话下。蓦然，只见毛泽东将烟头奋然攥在地下，仍是那句耳熟能详、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决不过黄河！全纵队在风雨中沿葭芦河逶迤北上，人人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接着，队伍折向正西，适逢五女河洪峰下

泻，水流湍急，指战员们临时搭桥，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安全渡过西岸。这样，中央纵队前后经历近20天的艰辛跋涉，于8月19日到达米脂县的梁家岔。这里，已经比较靠近西北野战军总部的所在地东原村了。

刚到梁家岔，毛泽东得知彭德怀正按照中央军委在行军途中的指示，部署沙家店战役，以歼击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便亲自策马前往，参加了西北野战军总部的作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小河村会议后的全国形势。他说，陕北目前还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但客观地看，敌人的困难远远大于我们。他讲解了7月以来我军在战略全局上“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进攻态势，指出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虽然没打下来，可是调动了胡宗南的主力，策应了陈谢兵团准备南渡黄河的战略行动，支援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从陕北局部看，我们似乎有些被动，但从全局来看，我们非常主动。陕北眼下的处境，就像我们常说的“过山坳”，现在快爬到山巅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过了山巅就是另一番天地，往后路子就好走了。毛泽东鼓励参加作战会议的全体指挥员说，沙家店这一仗，是彻底扭转西北战局，对全国解放战争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打得好坏，决定着我們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的大问题。这一席话，既富于哲理，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鼓起了战胜的信心。

第二天，8月20日，沙家店战役打响。毛泽东在梁家岔，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他确信：只要这一仗打胜了，胡宗南必然要收缩兵力，或抽兵去对付南渡黄河的陈谢兵团。这样，西北野战军就可以趁势打出去，西北的战局定可改观，全国局面就会满盘皆活。终于，电话铃急促响起，话筒那一端传来彭德怀兴奋的声音：“你是李德胜吗？”毛泽东手擎话筒，稍加停顿，作了一个异常响亮的回答：“不，我是毛泽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47年3月撤离延安的5个月来，毛泽东无论在任何场合下都一直使用李德胜的化名；此刻，他自行恢复使用了“毛泽东”这个振奋人心的名字，这表明，形势的确发展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沙家店战役歼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个师部、两个旅，俘虏敌旅长刘子奇以下6000余人，打破了胡宗南“一战结束陕北问题”的迷梦，结束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了扭转西北战局的进程。战役结束后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兴冲冲骑马来到东原村，庆贺西北野战军取得的胜利。在东原村，毛泽东挥毫为彭德怀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赞语，慰问了部队的干部战士，观看了硝烟未尽的战场，并在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

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握在我们手里。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野战军司令部，与彭德怀、习仲勋一起讨论了西北野战军进一步为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的问题。

离开东原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策马扬鞭，在习习秋风的吹拂下，赶赴中央纵队新转移的驻地朱官寨。未待稍加休息，毛泽东便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他精神抖擞地说：辛苦一些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我们将要创造崭新的历史！正是在朱官寨一间常年烟熏火燎、顶壁乌黑黝暗的破窑洞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方针》，向全军提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任务。

在这期间，从7月至9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尽管几个月来迁徙转战、戎马倥偬，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获得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长期战争这件大事。还在刘邓大军准备出击中原时，毛泽东就在致中央工委的电报中建议，中央工作委员会今后6个月的工作有三：一是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二是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三是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指出，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的成绩。

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毛泽东7月21日在小河村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由于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有进一步要求，因而需要有比1946年的《五四指示》更进一步的土地政策。7月25日，毛泽东读到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后，认为信中提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党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等问题十分重要；其中，关于发动群众考察、鉴定工作干部，领导机关必须主动承担责任等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为此，毛泽东在这封信上作了批语，指出：刘少奇的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信中所指出的问题，不仅在晋绥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刘少奇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各地领导机关应以此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收到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的报告，表示完全同意土地会议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的进行办法。同时，又着重指出，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和群众组织及其工作的问题甚为重要，希望在会议中加以

讨论。

中央纵队转移到朱官寨后，全国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中央工委报告了会议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讨论情况，并就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是否妥当请中央复示。9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中央工委报告的批示，明确指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并同意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9月下旬，中央纵队离开朱官寨到达佳县的神泉堡。这时，胡宗南已停止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往回收缩，形势变得缓和起来。毛泽东便分出一部分精力在黄河边搞农村社会调查。他帮当地老乡推碾子、打场、唠家常，转了几个村子，用去了10多天的时间。后来，毛泽东还到葭县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住了一周，一面听取谢觉哉等汇报土改工作情况，一面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了解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并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各阶层对土改的态度作了详细分析和研究。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神泉堡为中共中央签发了一系列历史性文件。第一个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决议要求各地讨论并采纳《中国土地法大纲》，并订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改正了1946年《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受客观条件局限所带有的不彻底性，公开举起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旗帜，极大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签发的另两个文件，是由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此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国内军

事、政治形势，历数蒋介石反动集团自1927年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现在一贯实行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指出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据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口号，并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亦即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首要一项，便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这条基本政治纲领相适应，在经济上首次提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新纲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因在10月10日公布，又称为“双十宣言”。“双十宣言”根据形势的迅猛发展，适时地改变了1947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暂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的决定，向国内外公开打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面旗帜。这个言简意赅的政治口号，实际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为全党、全军和国内各阶层人民指明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这对于调动人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如周恩来9月28日在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战士作的时局报告所指出：去年7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不行，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经过一年战斗取得的胜利，我们才能有根据有把握地提出这个口号。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够接受了。因为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采取相应的动员群众方法的郑重态度。

随着1947年冬天的降临，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离开佳县神泉堡向南转移，于11月22日抵达米脂县城以东40里外的杨家沟。这是一座约有270余户人家的地主庄园，周围筑有高墙深垒，据险易守。庄园里的住房虽然仍是窑洞式结构，但外有西式玻璃回廊，内里宽敞明亮，无论居住、办公、开会均很方便。毛泽东转战陕北整整8个月，头一次享有了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象征，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形势的确是真正好起来了。

这时，跳出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密切协同作战，已在南线广大

地域实现了战略展开。西北野战军进入内线反攻，连续发动延清战役和黄龙战役，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等城镇和地区，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使关中与华北连成一片；并利用冬季战斗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为转入外线作战做准备。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胜利结束了胶东保卫战，转入反攻，共歼敌 6.3 万余人，恢复了除沿海少数据点以外的大片地区，根本扭转了山东战局。晋察冀野战军的攻势作战，继清风店战役歼敌主力第三军后，趁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南北千余里已无敌人据点，华北局面从此为之一新。东北野战军继夏季攻势之后，又发动历时 50 天的秋季攻势，共歼敌 6.9 万余人，收复城市 15 座，将敌人压缩于长春、吉林、沈阳、四平、锦州等孤城和中长路、北宁路沿线狭小地区。

与此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一场深入、彻底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南线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很快取得显著成绩。结合土地改革，各地还为克服党内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开展了深入的整党运动。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国规模进攻的总形势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新的行动纲领，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 12 月份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一次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包括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在了解和掌握各方面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全神贯注地为会议起草书面报告。周恩来则召集一系列小型会议，研究战局、研究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以备会议讨论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处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又称中共中央 12 月会议。由于关山阻隔、战线遥远，大部分中央委员未能到会。实际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中共中央委员贺龙、陆定一、王明；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马明芳、张宗逊、王维舟；还有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共 19 人。

从 12 月 7 日至 24 日，先举行了 18 天预备会议。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改等几个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25 日至 28 日，正式开会，主要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纲领和政策。在报告的一开篇，毛泽东就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目前形势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进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来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种形势根本转变的特征，1947年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对此，毛泽东在会上逐一作了阐释：在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全国人心寄希望于共产党身上，而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在军事方面，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20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今年7月以后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因反攻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内容更合适。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无论如何已是不可能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蒋介石陷于危机的漩涡，无法脱出，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我们的经济也成问题，内线作战又遭饥荒；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根据地的负担减轻；收复了大片土地，办法更多，因我们有土地改革。此外，土改和整党，使党走上了轨道。土地会议即是整党会议，彻底揭发了党内严重不纯现象，从思想上组织上来整顿，使党的面貌为之改观。这几个方面的变化，构成了伟大事变的标志，而军事上人民解放军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则是主要标志。

为了使人民解放军在这个伟大转折中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军事部分里，系统地提出了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指出：这些军事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这就是说，它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我军在长达20年的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经验，即它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且也总结了进入战略进攻以来我军作战实践中创造的新方法和新鲜经验，即：在消灭分散、孤立的弱敌的同时，注意消灭集中和强大之敌；在强调打运动战的同时，注重阵地战和攻坚战；在强调歼敌有生力量的同时，坚决夺取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相机夺取敌人中等设防的城市，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夺取敌人守备强固的城市。这些新的概括，包含着对战争进程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明确地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

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基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在抗战结束后通过没收日伪资产和对人民巧取豪夺而极度膨胀的事实，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产生、发展，并对它的性质和特点作了深入浅出、环环相扣的精辟论述：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20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首次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及其重要特征的一种本质的把握。随着中国官僚资本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规律及其对生产力的严重桎梏日益显露，毛泽东适时地把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官僚资产阶级，提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总任务的高度，这就充实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政治口号的内涵，并继抗战期间写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内容。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还深刻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地位和性质上的区别，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相反，“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毛泽东还初步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即：“（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这些分析和阐述，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整个构想在认识环节上前进的重要一步。

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为了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针：“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和原则，毛泽东对中农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在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中农的意见，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如允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农民委员会和乡村民主政权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不要把属于中农成分的人错划到富农圈子里去；要公平合理地使中农承当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等。

关于整党，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和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已暴露无遗，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毛泽东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样，就向全社会，全国各党派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过去仅在党内进行解释，对外“心照不宣”，是为了不过早刺激国民党。现在公开宣布，是适应行将到来的历史大转变，敦促中间派在国共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囊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所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基本战略策略方针到具体政策，从行动纲领到革命的总任务，都适应形势的急剧变化作了新的论述和阐释，条分缕析，论证严谨，无一不与人民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和客观要求相吻合。这种对形势和任务的深层次的阐发，源于艰辛转战中马背上的深谋远虑，源于几度不过黄河的宏大气魄；更源于俯瞰战争全局的缜密观察，源于对战争规律的熟练驾驭。人们清楚地记得：从党中央进驻杨家沟到召开预备会议不过才10多天，强敌追击的危险际遇犹历历如昨，毛泽东便瞻全局了然于胸，挥洒自如地写下了这篇1.5万字的战斗檄文，又一次展现了他战略大家的远见卓识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

12月会议深入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1946年4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内容和观点，将它写入会议的决定。会议还决定：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并根据讨论的结果，分别作出相应的决定。

12月28日，毛泽东作了关于会议结论的讲话。他说：这次会令人兴奋。和1937年的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过去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份心。取得了现在的形势，便能作出结论。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会议通过的这篇文章（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当作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提出的纲领，更进一步。反对美帝、打倒封建、打倒官僚资本，这三个目标应该保证。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本，以共同反对这三个敌人，是正确的。中农问题是历来就解决了的，但这一次特别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不是新的，但现在集中力量打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故作为问题提出，有其作用。土地会议后，反右问题解决了，现在要解决“左”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对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

外人士的政策。

不久，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解放区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国民党方面和各民主党派皆开会研究，讨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的领导权问题。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则通过各种途径争相阅读、广为传播这个报告，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毛泽东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纲领。

为了使12月会议精神全面、准确地在全党贯彻下去，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会议的简报。后来经过几度修改，形成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原则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决定草案中，毛泽东首先从分析党内错误倾向的认识根源出发，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战略策略思想，即：“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如何反对党内“左”、右倾向，毛泽东还提出了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这样，就为全党正确识别、判断当前党内错误倾向并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决定草案中强调了“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同时又批判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党的政策是团结中农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全国，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封建阶级中

的开明绅士，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在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时，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新富农和旧富农，对地主和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以及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

在决定草案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他指出，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缺一，在农村，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在城市，就不能实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这个决定草案，为12月会议后开始的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工作提供了基本策略原则和政策基础。

自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以来，各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动快，来势猛，范围广，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性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但在运动猛烈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群众往往突破向封建地主夺取土地财产的政策界限，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中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平分一切工商业。而党的许多干部由于缺乏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的经验，又经受了整党中反右倾的批判，不敢坚持党的正确政策，放任或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使党的土改政策受到严重的冲击，导致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土改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另一方面，他又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地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

12月会议后，毛泽东对辗转来到陕北报告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去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的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达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向大海，是成功的。但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个浪花反掉，它将成为逆流。要把这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倾向纠正，这是一个完整的精神：维护主流，反对浪花，革命成功，一定反“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示了最大的决心，他说：党的经验是痛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破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在这上面要反潮流，宁可反到只剩我一个人，保持光荣的孤立。

关于“革命成功，一定反‘左’”这一点，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刘少奇在中央工委讨论12月会议的决议时说：今天只有“左”倾能挽救蒋介石命运，胜于美帝援助。因此，凡是牵扯到群众性问题，都应提到政策上去解决。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